

主 编 杜日辉
副主编 吴萍鲜 蔡雅娟
主 审 鲁俊生

中国思想文化概论

ZHONGGUO SIXIANG WENHUA GAILUN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中国思想文化概论

主 编	杜日辉
副主编	吴萍鲜
	蔡雅娟
主 审	鲁俊生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主要从中国文化中的思想文化入手,展现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从孔子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法家等中国古代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文化说起,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面临的困惑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及中国思想文化自身的变革进行了分析。随着“五四”运动和新文化的兴起,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有识之士的正确抉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新时期也不断得到了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思想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思想的精华,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灵魂,因此,梳理和分析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的历史脉络,将会促进中华民族继续向前发展。

本书不仅仅局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而且从传统文化发展的角度展现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时代意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思想文化概论 / 杜日辉主编. —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11

ISBN 7-81104-432-3

I. 中... II. 杜... III. ①思想史—中国—教材
②文化史—中国—教材 IV. ①B2②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00529号

中国思想文化概论

主编 杜日辉

责任编辑	郭发仔 刘立
特邀编辑	甘丹红
封面设计	新正多媒体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 编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金华市浙师教育图文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8 mm×260 mm
印 张	17.25
字 数	450千字
版 次	2006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50册
书 号	ISBN 7-81104-432-3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目 录

第一章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1
第一节 中华文化产生的背景	2
一、中华文化的含义	2
二、中华文化产生的背景	6
第二节 中华文化的特质和基本特征	9
一、中华文化的特质	9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12
第三节 中西文化之比较	16
一、中西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传统	16
二、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	18
第二章 儒家文化及其现代意义	29
第一节 儒学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	30
一、什么是儒家及儒家文化	30
二、儒家学说的产生	30
第二节 孔子的儒家学说	32
一、孔子的生平	32
二、孔子的礼学思想	33
三、孔子的仁学思想	35
四、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	44
五、孔子的教育思想	45
六、孔子的天命思想	47
七、孔子的中庸思想	49
第三节 儒学的传承与发展	51
一、先秦——中国儒学的奠基时代	51
二、两汉——儒家经学的独尊时代	52
三、魏晋隋唐——儒、道、佛的斗争与交融	53
四、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宋明理学	54
五、清代——中国传统儒学的清理与总结	55
六、现代新儒学	56
第四节 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	56

第三章 道家文化及其现代启示	68
第一节 道家文化概况	69
一、什么是道家	69
二、道家文化的基本特征	69
三、道家文化的发展	70
第二节 老子及其学说	71
一、老子其人其书	71
二、《老子》的主要思想	72
第三节 道家文化的历史传承	79
一、关列学派	79
二、杨朱学派	80
三、庄周学派	80
四、稷下道家学派	88
第四节 道家文化的现代启示	89
一、道家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89
二、道家文化对促进心理健康的启示	91
三、道家文化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92
第四章 法家与中国的法治文化	99
第一节 法家及韩非的法律思想	100
一、法家概述	100
二、法家思想的产生	100
三、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	102
第二节 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	105
一、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主张	105
二、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基本原则	108
三、古代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当代评价	112
第三节 中国法律思想的历史演进	116
一、我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	117
二、中国封建儒家正统法律思想的主要特点	122
第四节 树立公民法治观念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	125
一、当代公民应掌握的基本法治观念	125
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128
第五章 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	132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133
一、璀璨的中国古代文明	133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及困惑	135

第二节 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138
一、西方文化的产生及特征.....	138
二、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嬗变.....	141
第三节 西学冲击下的近代思想文化萌生.....	148
一、“夷夏之防”与“师夷长技”——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文化.....	148
二、太平天国的文化透视.....	150
三、洋务运动的文化意义及体用之辨.....	152
第四节 近代民族文化的开拓和资产阶级先行者的追求.....	157
一、近代政治变革与思想文化启蒙（资产阶级维新派——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157	
二、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的追求.....	159
第六章 现代中国新文化的兴起.....	166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	167
一、新文化运动浪潮的兴起.....	167
二、中西文化大交汇.....	173
第二节 蔡元培和鲁迅的思想.....	179
一、蔡元培的教育救国思想.....	179
二、鲁迅的思想.....	183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188
一、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188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89
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较量.....	192
第七章 毛泽东与 20 世纪的中国文化.....	196
第一节 毛泽东与新民主主义文化.....	197
一、毛泽东生平简介.....	197
二、毛泽东与 20 世纪的中国文化.....	197
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	199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	207
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207
二、毛泽东思想的文化内涵.....	208
第三节 毛泽东的人格魅力.....	211
一、毛泽东的人格素质和思想的形成.....	211
二、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和英雄风范.....	214
第八章 邓小平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217
第一节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	218
一、邓小平生平简介.....	218

二、邓小平与中国传统文化.....	218
三、邓小平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220
四、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226
第二节 邓小平理论.....	232
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233
二、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234
三、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234
第三节 邓小平的风范.....	235
一、邓小平风范的形成.....	235
二、邓小平的崇高风范.....	237
第九章 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	239
第一节 伟大的中华民族.....	240
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240
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特点.....	243
第二节 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244
一、民族精神的含义.....	244
二、中华民族精神的作用.....	246
第三节 中华民族精神的优良传统.....	249
一、团结统一——中华民族精神的首要前提.....	249
二、爱好和平——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	250
三、勤劳勇敢——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	253
四、自强不息——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	255
第四节 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	258
一、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	258
二、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260
三、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261
四、当代中国的爱国主义.....	263
参考文献.....	268
后 记.....	270

第一章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文化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其展示了人类社会在过去的历史时期发展、进化的成果；同时，它又是当今世界所有财富的总和，更是将来人类辉煌的孕育者。可以说，正是文化的一脉相承和薪火相传，使人类社会由低级走向高级，从平淡步入辉煌。纵观人类文化史，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四大文化系统，即中华文化系统、印度文化系统、阿拉伯文化系统、西方文化系统。在上述文化系统中，中国文化以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绵延不绝而独具特色。

第一节 中华文化产生的背景

一、中华文化的含义

“中华”之得名，由来已久。华夏先民因建都黄河流域，四裔环绕，故自称“中华”，亦指地处中原的华夏族。中华之“中”，意为居四方之中，又有“以己为中”之意，与“以人为外”相对应；中华之“华”，意为具有文化的民族。

中华民族用以泛指历来在中国境内休养生息的各民族。中华民族，背靠“世界屋脊”，自西向东，俯视着浩瀚的太平洋。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他们辛勤劳动，历尽艰险，创造性地发展着自己的文化。

中华文化即中华民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创造的文化。中华民族是由华夏族衍化而来的汉族以及 55 个少数民族的总称。因此，中国文化不仅仅是指汉文化，还包括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当然，汉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传统文化呢？

“文化”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 1952 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 160 多种。

“文化”是一个中国古已有之的词汇，在近代吸收西方学术思想后，其又增加了新的含义。文化概念的演化，绝不仅仅是一个定义变迁的问题，它实际上反映了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内容的日益丰富以及人们对文化理解的广延度和深刻度。

中国本土文化在接纳外来异质文化的过程中，引入或改造了许多新概念和新范畴，从而使中国文化的思想内容和表述方式得以丰富和发展。这些新概念、新范畴，有的以音译的方式出现，如从印度佛学中音译而来的“佛陀”、“涅槃”、“菩萨”、“般若”、“三昧”；从欧洲文化系统中音译而来的“逻辑”、“德谟克拉西”、“赛因斯”、“英特那雄耐尔”、“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华尔兹”等。但音译的概念不易为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一般难以在作为形意文字的汉字文化系统内久远流传，于是又有了意译的方式。其具体办法是，借用相关的汉语字、词，或新造复合词，用以表达特殊的含义。如“法”、“业”、“戒”、“色”、“空”、“识”、“相”、“性”等，本是中国所固有和常用的字，佛教翻译家们借用这些词，来表述佛学意蕴。外来思想也大多是借助汉语字、词而广为传播的。至于“世界”、“时间”、“空间”、“宗教”、“哲学”、“本体”、“一元”、“观念”、“归纳”、“演绎”、“美学”、“体育”等词，则是古代佛学翻译家和近代西学翻译家利用汉语单字的某种含义，加以复合，组成新词，以表述外来学术思想的特殊含义。

今天通用的“文化”一词，便是近代学人在译介西方相关语汇（如拉丁文 cultura）时，借用中国固有的“文”、“化”及“文化”等字、词语再创而成的。

在汉语口语系统和典籍中，“文”和“化”是常用词汇。

“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与“德行”对称的“道艺”等；又由纹理义导出彩画装饰之义，引申为修饰、人为加工、经纬天地，与“质”、“实”对称；进一步推衍为美、善、文德教化，以及文辞、文章，与“野”对称，或与武事对称。

“化”则有变、改、化生、造化、化育等义。归纳起来，“化”的含义是：二物相接，其一方或双方改变形态和性质。由这层内涵又可引申为教行、迁善、告谕使人回心、化而成之等。

“文”和“化”并联使用，较早见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传》。《易·贲卦》的《象传》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用天象有规律可循（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通过这种现象可以认识天的变化规律），比拟人伦也有规律可循（人类有文明礼仪，则能止其所当止。观察人类社会生活的这种现象就可以教化天下人走上正途）。这里的“文”从纹理义演化而来，“天文”指天道自然规律；“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具体指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纵横交织的关系，如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这些关系构成复杂的网络，具有纹理表象，因此，“人文”指人伦序列。“人文”与“化成天下”紧相连接，已逼近“以文教化”的表述方式。而“以文教化”（即以人伦秩序教化世人，使之自觉按规范行动）便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一词的基本含义。唐人吕温（772—811）的《人文化成论》对此义有所阐发。然而，《易传》中“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毕竟没有构成“文化”这一完整的词。西汉以后，“文化”正式作为专用名词使用，如“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等等。后来“文化”的含义都大体沿袭此义，指用体现道德、政治伦序的诗、书、礼、乐教化世人，与武力征服相对应。

总之，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基本上是属于精神文明（或狭义文化）的范畴，指文治教化的总和，与天造地设的自然相对称（“人文”与“天文”相对），与无教化的“质朴”和“野蛮”形成反照（“文”与“质”相对，“文”与“野”相对）。在中国古代，“文化”一词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又与之相联系，两者相辅相成，正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

在西方，“文化”一词德语是 Kultur，英语是 Culture，两者都源于拉丁文 Cultura，其原义是指耕种和植物培育。以后，在古代欧洲人的视野中，“文化”的含义由物质生产领域拓展到精神领域。中国历史学家朱寰认为，“文化”（Culture）与“文明”（Civilization）从西方语言中的词义来看，“这两个词都来自古罗马，拉丁文为 cultio、cultura，原意为耕种和栽培，引申有开拓、教化、培养、修炼之义。”^①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前 106—前 43）曾提出“智慧文化即哲学”这一名言，其词义已具有人的心灵、智慧、情操、教育等内容。进入 18 世纪后，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等赋予文化概念以精神的或观念的意义。如伏尔泰认为，文化体系包括了在宗教、艺术、科学等领域

① 朱寰：《从文明的冲突说起》，文明比较研究，2000（1）：4。

所体现的具有高度精神价值的事物。简言之，文化乃是人作为有理性的实体的合目的的创造性活动。他们对“文化”的定义，突出了文化主体改造自然的活动、理想及其功能。

从以上关于“文化”的概念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总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它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就狭义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一般而言，我们更多的是在狭义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概念，并把握不同文化形态的特征，如根据文化的不同功能，可以将文化分为礼仪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根据文化的不同形态，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还可将其分为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等；也可从文化的历史演变，将其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文化又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观念文化三个层面，思想文化属于文化构成中的最深层面——观念文化。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侧重于思想文化。

中国的权威辞书《辞海》对文化一词的解释，就综合了这两种说法。广义的文化主张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即物质生产和精神创造的成果都视为文化的研究对象；狭义的文化认为只有社会意识形态才是文化研究所要关注的对象。广义的文化又称“大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许多领域，如认识领域，包括语言、哲学、科学、教育等；规范化的文化，如道德、法律、信仰等；艺术领域，如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器用科学领域，如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相关的制造技术等；社会领域，如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这里既有物质文化，又有精神文化。有的学者将广义的文化分为四个层次：第一，物态文化层。其指的是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衣、食、住、行方面的文化，如农业、纺织、建筑、车船等。它直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第二，制度文化层。其指处理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准则，包括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家族制度等，涉及家庭、民族、国家、宗教团体、教育、科技、艺术组织等。第三，行为文化层。它以民风、民俗的形态出现，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正如古人所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第四，心态文化层。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其中又分为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次。从这四个层次可知，凡是由人类创造的物质的、精神的成果都可以称为“文化”。

与广义的文化相对的即狭义的文化，其中不包括物质创造及其成果，只包括精神创造及其成果，故而又称作“小文化”，指的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从发展文化学的角度看，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近代文化以及“五四”以后的新文化。传统文化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主要是指封建社会的文化。现代文化产生于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是今日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正在努力创造的新型文化。传统与现代之间本无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文化转型也绝不意味着文化断裂。因此，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必须要对两者的关系有一个辩证的认识。

第一，民族文化的发展，不能脱离长期在共同地域、语言、心理等基础上所形成的

民族创造精神，一部中国文化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不断扬弃、更新和再生的历史。现代的中国文化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在世界文化史中，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绵延不绝而又不断推陈出新的现象，既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又令世人瞩目。

第二，传统文化并非静止不变的，传统文化一经形成，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更，其形式和内容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传统文化既有流动性的特征，又有恒常性的一面，即它的合理内核不可能随时代的发展而消解，而会随着历史的推移被融入现代文化中，生生不息，并不断自我更新。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不仅指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而且还包括在近代文化以及现代化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我国的古代文化，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文化。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所谓“源远”，是说自从中国产生人类的那天起就有了中国的历史，也就有了中国文化。它源于中国各族人民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也就是社会生活的实践；它还吸收了周边各国文化的积极成果，如印度文化、阿拉伯和波斯的伊斯兰文化、朝鲜半岛的音乐文化，以及日本的古文化等。所谓“流长”，则可以从其流传的时代、文化的类型以及传播的地域来说明。

(1) 中国传统文化如按时期划分，可以分为九个时期：① 史前时期、原始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包括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② 殷周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又称青铜文化。殷人尊神，有人称其为神本文化；周人强调重天保民，人称尊礼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忧患意识乃至“天人合一”思想等都是从此发源的。因此，儒家一般将周文王、武王、周公当作开创儒家文化的圣人。③ 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一时期，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人将这一时期称为周公传统文化的轴心时代，它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它基本上奠定了周公传统文化的基础。④ 秦汉时期。从一统帝国，到文化的大一统；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汉武帝建太学，思想文化领域又出现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⑤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为乱世时期，文化出现多元化。如玄学的兴盛，道教、佛教的兴起。⑥ 隋唐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是封建文化的辉煌时期。⑦ 两宋时期。在这一时期，市井文化勃兴，出现了士大夫阶层和市民文化，“程朱理学”兴盛。⑧ 辽夏金元时期。这一时期为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相冲突的时期。元曲开始兴起，出现了中外文化交流。⑨ 明清时期：明末清初时出现了启蒙思想家、考据学、古典小说，出现了“西学东渐”现象等。

(2) 按地域、民族划分，远古时代可分为三大文化集团，即华夏文化集团、东夷文化集团与苗蛮文化集团；也有人将古代文化分为黄河文化、淮河文化与长江文化，此后，华夏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当然，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直到今天，少数民族还有各具特色的文化，如白族、纳西族等。

(3) 按学派划分，则可以分为诸子百家文化与三教九流文化等。“诸子”本是对春秋战国时期著名学者的尊称，“百家”是说学派众多。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学派也不过十多家，即儒、墨、道、法、阴阳、名、农、杂、小说、纵横、兵。除去兵家为军事学之外，其他十家即习惯上所说的战国十家；十家中去掉农家，即人们常说的

“九流”。三教九流中的“三教”，指的是儒、道、佛三教。但在春秋战国时，虽然已经有了儒家和道家，但尚未形成道教；而佛教则是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从印度传入的。

(4) 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则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古代，中国文化传播到了日本、朝鲜、印度、东南亚各国以及阿拉伯国家、欧洲国家，在亚洲形成了一个“汉文化圈”。在近现代，华侨遍布世界各地，中国也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中华先民以其勤劳智慧和非凡的创造力，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中华文化产生的背景

人类文化的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不同的地理环境提供了不同的自然生态条件和资源，从而影响到生活在该地域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与其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形态，最终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类型。

1. 地理环境

中华民族栖息生养于北半球的东亚大陆，在这里，他们创造出了独具风格、丰富多彩的文化。

当我们把中华民族数千年间生于斯、长于斯、创造文化于斯的这片空间置于世界地理的总背景上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特征——它的领域广大，腹里纵深，回旋天地广阔，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复杂多样，有一种恢弘的地理环境。

中华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是黄河流域。这片方圆七八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和冲积平原，在古代曾经是林茂草肥、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域，华夏先民在这里狩猎、放牧，发展农耕地，从而奠定了文明的根基。

过去习惯于把黄河流域称作中华文化的摇篮。此说固然不错，但中华文化的策源地又绝不限于黄河流域。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等猿人化石的发现，表明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一百多万年或几十万年前，已栖息于东亚大陆的广大区域。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证明，不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辽河流域以及西南崇山峻岭间，也都有长达四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史，这些地域同样是中华文化的摇篮，其总面积当在五百万平方公里左右。

自殷商起，中国正式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时期。此后，中华先民的活动地域愈益扩展。自秦汉以后，先民继续开拓疆土，实行民族交汇，形成有广大民众的大帝国。后又经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发展，终于奠定了今日中国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土，从而为中华文化的滋生、繁衍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中华文化的繁衍地不仅领域广大，而且其地形、地貌复杂，气候丰富多样，多条长江大河纵横，这在世界上来说，实为罕见。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 2/3，盆地和平原约占 1/3。山脉多东西走向，河流因而也多东西走向，故东西行较易，而南北行较难。为解决这一交通问题，古时中国便开凿了许多南北运河。

按气候带进行分类，人类各民族可以粗略地分为寒带民族、温带民族和热带民族。由于温带气候适中，能提供了较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所以温带—暖温带便成为文明的发祥地和繁盛之区。“……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①而中国正处在北半球的温带—暖温带，这里有“自然之富，物产之丰”，这显然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得以滋生的一个先决条件。

中国大部属温带，亚热带区域也不小，最南部伸入热带，最北部伸入亚寒带。这种多样化的气候带给农业经济多样发展提供了地理基础，如秦岭、淮河以北成为以小麦、粟米为主要作物的旱地农业区，秦岭、淮河以南成为以稻米为主要作物的水田农业区。又由于降雨量的大势是东部充沛而西部稀少，这又为东部形成农耕区、西部形成畜牧区提供了自然基础。中华文化内部的南北之别、东西之异，正是植根于这种与地理环境有密切依存关系的经济生活土壤之中。



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陵

中华文化自其发生起，即因环境的多样性而呈现丰富的多元状态，到晚周，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已大体成型。东临沧海、山海兼备的齐鲁文化异于处在“四塞之地”的秦文化；地居中原的三晋文化不同于南方的楚文化；同在长江流域而分处上游、中游、下游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与吴越文化又各有特色。至于在湿润的东部发展起来的农耕文化与在干燥的西部发展起来的游牧文化，更是大相径庭。这些文化类型的形成当然有人文因素强力作用的影响，不过，地理环境的多样性终归是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基础。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各地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政治水准也参差不齐，因此，各地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这种由地区多样性导致的文化多元倾向，与文化“大一统”倾向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这个东方大国文化的显著特点。

半封闭的大陆—海岸型环境为中华文化提供了独立发展的地理前提。而这种文化发展的独立性在历史上发挥过双重功能。

第一，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华夏中心主义的心理定势，即以华夏为天下的中心，视环绕华夏的邻邦为夷狄、蛮戎。

第二，偏居一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保护反应机制”，从而使中国文化具有超常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 农耕经济

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长江和黄河等大江、大河由西向东奔流入海，其所携带的泥沙积淀成辽阔肥沃的大平原。从太平洋吹来的东南季风，给长江中下游地区带来了丰沛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 1956 年版，第 124 页。

的降水，为农业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考古发掘证明，在距今约 6 000 年的仰韶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已见谷类遗迹或稻谷遗迹；在距今约 4 000~5 000 年的龙山文化遗址和屈家岭文化遗址，也出土有石锄、石镰等农具，这表明中华先民早在六七千年前，已逐渐告别狩猎和采集经济时代，步入以种植业为主的农耕时代。至商周，农耕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崛起于中国西部的周人，是个典型的农业部族。被周人尊为先祖的后稷，被奉为农神。以农为本，以农立国是周人根深蒂固的经济和政治理念。

周代以来，历代王朝都把重农作为治国之道。以农立国的国策、农耕工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提高，大大促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长江流域稻作经济的普及，以及朝廷移民开边屯田政策的推行，使中国的农耕区不断拓展。在近代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育以前，中国经济结构的主体是农业型自然经济。农耕经济是古代中国立国的基础，也是传统文化赖以发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此外，在中国北方的草原上自古生活着游牧民族，从早期的匈奴人到后期的突厥人、蒙古人，都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强悍民族。但是，北方气候周期性的变冷、变干，迫使游牧民族南下寻找新的宜牧地区。因此，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的经济与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全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从五代十国至宋元、从明末至清代，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地区共有过三次大的冲击。一方面，在军事征伐和政治角逐中伴随着文化的碰撞；另一方面，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碰撞中得到了交流、互补和融合。除战争外，民族间的“和亲”、互市、迁徙、通婚等活动，也促进了中国境内不同类型文化的融合，从而逐步形成了以农耕文化为主、兼容并包、气象恢弘的中华民族文化。

3. 社会结构

社会组织结构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关系，即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所存在的互动，它是社会秩序统一的体现。中国古代是一个等级社会，从先秦至明清，尽管社会形态有所变化，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结构却长期沿袭未变。恩格斯曾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寻找。”^①社会结构与社会经济（业缘）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也是血缘、地缘等相关性要素复杂整合的结果。

就业缘而言，古代中国几千年所沿袭的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传统农业模式，国民的主体——农民大多稳定地聚族而居。他们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取资于土地，从事着程式化的劳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大体以“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为特征。^②

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强化了安土重迁及服从权威的国民心理。他们认同宗法等级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5页。

② 见白居易：《白氏长庆集·朱陈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的“合法性”，即对享有权威的人的服从和对作为神圣规则的礼的认可。

就血缘关系而言，一个宗族世代生息、繁衍于一个地区，血缘的纽带自然地就把宗族成员联结成一个宗族自治体。本来，依血缘而结合为群体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各民族的氏族社会中，在生产水平低下的状况下，氏族成员曾借此以自助、自卫。在人类向文明社会迈进时，各民族因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差异，血缘的纽带作用也呈现出弱化或强化的变化。

例如，在古希腊，希腊人在跨海迁徙中不同种族的人出于利益驱动，打破了原有的血亲纽带，伴随着移民浪潮，出现了杂居和债务奴隶现象，传统的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的氏族贵族统治日趋弱化，城邦制国家随之诞生。但中国与之不同，由血缘家族组合而成的农村乡社，被世代保存了下来，土地转化为贵族专有，首领转化为地方官员，族人尊崇共同祖先以维系亲情。至少在西周时，以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和宗庙祭祀制度为标志的宗法制已经确立，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模式。尽管以后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但形成于奴隶社会的宗法制又随之演变为封建的宗法制。梁启超认为：“吾中国社会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齐家而后治国是也。”^①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和宗族，是一种社会关系，也是一种政治组织，在结构上表现为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宗族，再组合成社会。为了维护这种组织形式，辈分、嫡庶、长幼、主从等等级秩序都有严格的区分。君民关系是“君父”与“子民”的关系，君权与父权互为表里，“家”与“国”彼此沟通。这种垂直型的社会结构，植根于农业经济的土壤，依赖于宗法制的维系，同时也给中国文化打上了极为鲜明的烙印。

第二节 中华文化的特质和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推动和思想家们的概括、提炼，逐步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品质。这些优秀文化传统固然有文明和文化的一般共性，但由于其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孕育的，故而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质，它对于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对于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一、中华文化的特质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中国文化的特质正是由其特定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从地理环境的角度看，我国处于一种半封闭的、高度稳定状态的大陆性地域，与西方地中海沿岸的民族有很大的不同；从物质生产方式的角度看，我国文化根植于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封建的小农经济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与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海洋民族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从社会组织结构的角度看，宗法制度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专

① 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这在世界历史上更是罕见的。

正是上述独特的自然、历史条件的相互影响和制约，使得与之相适应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如果从整个世界文明与文化发展的历史来考察和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就世界范围而论，中国古代文化虽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却不是最早的。但在世界上所有古老文明与文化演变中，唯有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延续力和时空穿透力。正是这种无与伦比的延续力和穿透力，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并发展至今的一种文化类型。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先后因亚历山大大帝占领而希腊化、恺撒占领而罗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则因日耳曼族入侵而中断并沉睡千年。但是在中国，此类情形却从未发生过。

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强健的生命延续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东亚大陆特殊的地理环境提供了相对隔绝的状态，这是其缘由之一；而华夏文化长期以来明显的先进性多次“同化”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反复上演着“征服者反被征服”的历史戏剧，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化虽未受到远自欧洲、西亚和南亚而来的威胁，但也屡屡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如春秋以前的“南夷”与“北狄”交侵，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人接连南下，明末时期满族入关，等等。这些勇猛强悍的游牧民族虽然在军事上大占上风，甚至多次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政权，但在文化方面，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被以华夏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同化。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在与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接触中，几乎都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或飞跃。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毁灭与中断，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进步。而在这一过程中，华夏传统文化又多方面地吸收了新鲜养料，如游牧民族的骑射技术，边疆地区的物产、技艺等，从而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犹如万里长江，是由无数高山上的涓涓细流汇合而成的一条奔腾的大河，它一直向前，从不中断，直到汇入大海。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发展中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汇入、综合了我国各民族的智慧，形成了独特的具有强盛生命力的文化体系，成为世界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奇观。

(2)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非凡的包容、会通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从不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而总是能以非凡的包容和会通精神来丰富和完善自己。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精神首先表现在对诸家学说采取兼容并蓄的学术会通。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家虽各有所尊，却又提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诸道并行而不相悖”，并把这当作文化发展的理想境界。所以，春秋战国时虽百家争鸣，互相驳难，但也相互吸收，取长补短。如吕不韦就主张统览百家，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上。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佛）、道三家的长期并存，便典型地反映了这一包容、会通精神。所以，在中国古代，儒、释（佛）、道三教的神可以并列于一堂。在《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中更是可以见到三者合一的许多描写。唐太宗在《大秦景教碑》序文里，甚至表达了任何宗教都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思想。不仅如此，古代中